

CONG
BENG
KUI
DAO
ZHONG
XING

Shang Hai Gu ji chu ban she

从崩溃到中兴

刘修明 ● 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78797 K234

从崩溃到中兴

——两汉的历史转折

刘修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从崩溃到中兴

——两汉的历史转折

刘修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插页2 字数 262,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5-0600-2

K·56 定价：5.80元

自序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著作怎么写，成了问题。史学著作难以出版，读者对各种形式的史学著作，有着不同以往的选择标准，所谓“史学危机”，在困惑着史学工作者和编辑同行们。历史要求人们思索，史学的现状也要求史学工作者反省，从历史的反思中总结，从旧我中解脱，从批判的继承走向新的探索。

这本不成熟的书，就是作者在反思和探索中的一个尝试。虽然写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经过了多年的考虑与摸索。作者试图在继承和学习中外古今一切优秀著作优点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两汉之际的历史，从纵横两方面尽可能恢复它生动活泼的历史面貌，再现它壮阔、雄伟又曲折、坎坷的历史场面。历史转折时期通常是丰富多采的，同时又包涵着发人深思的历史哲理。历史的转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社会的急骤运动一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上升与下降，坎坷与曲折，前进与倒退，改革与暴动，破坏与建设，构成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一切正常的社会生活破坏了，反常的社会生活主宰着动荡的世界。正常变成不正常，反常又包孕着正常。历史大转折后，新的正常社会生活会拉开序幕。在大转折、大动荡、大变幻

0261/54 20

中，时代的狂飙会把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推上历史舞台，以他们特有的个性和面目表演着各种形式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我所以选择两汉之际这一历史时期作为写作的范围，除了对这段历史较为熟悉以外，就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历史是有其永恒价值的。转折时期的历史，比之“升平之世”的历史，其价值量显得尤为珍贵。它包含着由全民族的沧桑坎坷和无计量的血泪换来的历史经验，又是社会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先导。

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常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是历史的经验并不是经常那样深切地引起人们的重视。黑格尔曾讲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人们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历史哲学》，中译本，第44页）中国封建社会不断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往往使人误解为这是历史的循环。实际上，中国历史是螺旋型的渐进，只是其螺旋太密，螺距太小，相似点又太多。但是，黑格尔那尖锐而深刻的言词确实打中了剥削阶级政治家们的要害。历史演绎是有法则的，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历史规律。由于阶级的、社会的各种原因，统治者们或是不认识，或是不愿意按照历史法则行事，历史的反复，历史的惩罚，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历史经验与现实功利，在阶级社会里永远是一对矛盾。少数人以历史为借鉴和多数人对历史的茫然，又是一对矛盾。当绝大多数人没有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包括历史）和认识自己的时候，这些矛盾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自觉认识客观社会历史规律并把

这种认识付之于实践的时候，只有人们从历史和战略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身处的现实，历史的经验才能成为具有实效的精神财富。

这本书在写法上有别于以往某些历史著作。我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吸取了祖国史学名著《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和国外古今许多历史名著的写法，通过有血有肉、有“虚”有实、有人物形象、有历史场景、文史结合等写法，具体形象地阐述这一转折时期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和观点，我尽量摒弃那种我们习用的论文或教科书式的论述方式，而把它贯串在事件的变化和人物的行动交往中。这样，也许能使活生生的历史不致于仅仅是那么一副骨架和几条筋肉的混合体，而让读者在事件的发展变化和人物的行动交往中，具体领悟历史的启示。因而，这本书不是传记文学，也不是列传、合传、别传的组合。它既非编年史，也非纪事本末体，更非教科书体。但又包含着它们的某些特征。从史学的分支学科上说，它也不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社会史等板块式的组合。

这样的写法，也许应具有可读性，但追求可读性不是我的目的。历史本身比任何可读性强的读物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可读性只不过是丰富的历史画面有限的表现手段而已。而这些，在五十年代以来国外某种教科书学派和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某些陈旧内容和形式的影响和政治浪潮、形而上学的干扰下，几乎被剔除净了。结合当代人文化学术上新的要求，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成功的创造，是学术文化在历史阶梯上创新和前进的必要前提。

可读性的先决条件，应当是科学性。前面提到，历史必

须以事实为根据，不允许小说家的想象。可读性、形象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和事实的基础上。一本历史著作，应当是哲、史、文的结合，理论是它的灵魂，史料是它的基础，文字是它的形式。历史科学追求的目标，是从史中求实，从实中求是。“是”即规律，也即中国古书中所谓的“道”。“文以载道”，“道”是根本的，但“道”必须符合事实，以大量经过审核过的事实为根据。这三者，我都是欠缺的。三者的较完美的结合，是我的努力方向。在这本书中，我以有限的水平，尽可能在掌握两汉史料（文献的，辅以考古的）基础上，来恢复历史的原貌。书中陈述的事件、人物等，都以史料为根据，注明出处，有些材料在注释中作了考订，有些问题在附注中加以说明。即使对人物的心理、礼仪和环境的描写，也尽可能不要游离于那个时代之外，不要远离历史的真实。对于有些同志奉克罗齐“一切的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圭臬的信条，我是有保留的。虽然主观上努力这样做，客观上的距离仍然很大。

广义的历史是人类的文明史。文明的含义要比文化广泛得多。它可以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要再现一个历史时代，不能不注视这个时代文明的种种表现形式。但要我在这部书中全面反映两汉之际的社会文明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是这本书的主旨。为了顾及历史的完整性、具体性和生动性，我在众多学者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他们的成果，尽可能反映和表现两汉时代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结合两汉的历史转折中的人与事，描述当时的经济生活，城市风貌，服饰饮食，婚丧礼俗、精神风貌等等。我希望这些描述不是节外生枝、画蛇添足，而能配合主题，

融为一个整体。能否如愿，要看实践了。

既然作为一本历史著作，尽管它是不成熟的，也不应该是旧史书或以前著作的翻版或改写，应当有自己的观点。这几年来，我写了若干篇有关两汉历史的论文，对某些学术问题提出了我的看法。在这本书中，除了吸取我已发表的某些不成熟的观点以外，还对另外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诸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趋势问题，两汉之际的历史转折问题，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社会结构问题，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农民起义的属性问题，王莽改制问题，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思想意识和文化问题，以及某些人物的评价问题等等。不敢说有自己的“体系”（就个人来说，有时一辈子的努力也未必能形成自己的体系），但对某些问题我都提出了自己粗浅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没有以论文的形式表述，而是寓论断于叙述之中。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我已以论文形式写成《两汉的历史转折》一文，刊载于《历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中，读者可以参阅。

人民参与创造了历史，应当让历史从研究者的书斋里走出来，从政治家“治鉴”的镜框里走出来，让成千成万的人民深入具体地了解历史，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了解她的成就与包袱，她的光荣和耻辱，她的曲折与灾难，她的牺牲和代价。历史应当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唯其这样，才不致于使历史成为少数人醉心其中的象牙塔，也不是少数人研究“治术”或“权术”的教科书。当全民族的大多数人都自觉要求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并吸取历史经验、展望未来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就会加快。历史使人明智，但决不能只使少数人明智，而让多数人仍然

陷于愚昧状态。如果是那样，那还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是危险的。一个民族不深切了解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理论思维，就不懂得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进行历史预见，那就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付出的历史代价已经足够沉重的了。付出了代价而得到收获的时代应该到来了。历史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绝不是一项具体的科学发明的效果所可比拟的。作为一个植根于长江、黄河灌溉的土壤上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在这方面为祖国为民族做点事。

“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我给自己拟定了攀登的目标，但水平、能力和目标的矛盾，也许使我连“中”的目标也达不到。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只能老老实实，攀登一步是一步。每一步只能从零开始。从绝非自谦的意义上说，这本不成熟的书只能是“抛砖引玉”。一批有创见，形式新，既能得到专家首肯，又能获得广大读者欢迎的历史著作，必定会茁壮成长在有悠久传统的中华史林之中。

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诸同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关编辑的指导与帮助。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我真诚地期待专家与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作者

1987年11月于上海长寿桥畔

目 录

自序

一、从巅峰滑向深渊	(1)
登上顶峰.....	(1)
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12)
公子哥儿们.....	(32)
权位与裙带.....	(48)
腐败的官僚.....	(57)
苦难的承担者.....	(68)
二、危机	(77)
危象种种.....	(77)
“天谴”与谏诤.....	(87)
挽大厦于将倾.....	(97)
三、王莽：转折时期的怪物	(103)
勃起的根基——王氏外戚集团.....	(103)
在篡权的道路上.....	(111)
“改制”.....	(131)
从经师到“国师”.....	(153)
血溅渐台：新莽的毁灭.....	(170)
四、叛乱、角逐和统一	(189)
绿林和刘玄.....	(189)
赤眉·樊崇·刘盆子.....	(205)
从长安游学 to 舂陵起兵.....	(227)

转折点：昆阳之战	(241)
“降大任于斯人”——北征	(254)
郾城称帝	(271)
五、中兴：在废墟上重建	(287)
简政·进贤·集权	(287)
释奴诏和“度田令”	(310)
文治与迷信	(322)
“四夷来宾”	(346)
光武帝的婚姻、家庭、生活和晚年	(364)

一、从巅峰滑向深渊

登 上 顶 峰

元封元年（前110）四月，汉帝国的主宰汉武帝率领群臣，携带大量特地制造的封禅礼器，不远万里，从京都长安（今西安市）出发，浩浩荡荡东行^{〔1〕}。为了便于大批人马行进，武帝命天下郡国修缮了所有的黄土驰道，加固了桥梁，沿途的离宫别馆，也进行了修整。这是汉代对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始建驰道以来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修缮工程。经过整修的驰道，路面平整，绝无杂草。驰道中间三丈属于皇帝专用的道路，等候它的主人率领千军万马，奔向东方。

汉武帝此行的目的，是祭泰山，告天地，昭示大汉王朝的威德，敬祈上苍保佑帝国的长治久安。前些日子，当他得知宠臣司马相如病危的消息，就立即派使臣所忠到京城附近茂陵邑司马相如家，询问司马相如的病情，搜集他的书籍和著作。汉武帝怕相如一旦逝去，著作、书籍散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忠急急赶到相如家，相如早已溘然死去。所忠向悲戚的卓文君说明来意，文君说：“长卿未死时，留下一卷书，他说，如果使者来求书，就把这卷书奏给皇帝。”司马相如这

卷遗书是劝汉武帝行封禅大礼、登祭泰山的，他希望皇帝“躋梁甫、登太山，建显号，施显名”，以显示“大汉之德”。汉武帝被遗书中“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卒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这几句话打动了^{〔2〕}。他为司马相如直到临死仍不忘忠君的可贵精神深深感动了，嗟叹不已。古代帝王封泰山的事，特别是秦始皇封泰山的壮举，早就打动他的心。汉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列祖列宗都未能登封泰山。这件功垂史册的大事，将要由他来完成，这也是合乎臣民愿望的^{〔3〕}。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重要形式。封禅，是“封”和“禅”两种祭祀形式的合称。按《史记·封禅书·正义》的解释，“封”即“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禅”即“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封”是祭天的仪式，“禅”是祭地的仪式。（但秦始皇、汉武帝封泰山时还没有天地阴阳之别，是笼统地祭祀天地。东汉光武帝刘秀行封禅礼，才分封禅为祭天祭地。）汉代古籍《白虎通·封禅》说得更明白，做了皇帝，一定得向上天报告，否则就不能说完成就位天子的礼制：“王者易姓而起，必封升泰山何？报告之义。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汉朝换代秦朝已经九十多年了，离秦始皇封禅也已经一百零九年（前219～前110）了，这一重大的祭祀仪式尚未完成，怎么说得过去？汉武帝一定要隆重地完成祖先们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大事。

封禅大礼，势在必行。但怎么个搞法，武帝心中无数。他把公卿儒生五十多人召集起来，商议此事。由于多年未行封禅礼，谁也说不清大礼礼仪。武帝命一批儒生参照《尚书》、《周官·王制》的记载，草拟封禅礼仪。儒生们寻章摘

句，搞了好久，也搞不出来。武帝很不高兴。他问左内史兒宽有什么办法，兒宽是个聪明人，他答道：“封泰山，禅梁父，是帝王的盛大典礼。臣以为，只须按圣主旨意祭告天地就行了，不必听群臣的纷纭议论。”武帝听了果然称心^{〔4〕}。他日思夜想，自己定了一套封禅礼仪，又定制了大批封禅礼器，为封泰山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前，元鼎六年（前111）冬，武帝率兵十几万，北巡朔方（今内蒙杭锦旗北），途中，在柏树森森的桥山（今陕西黄陵县北）祭了黄帝陵。翌年，元封元年三月，又东巡缙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礼拜中岳太室山（嵩山）。在离宫驻蹕时。从官听到山上隐隐约约地喊了三声“万岁”，马上把这事报告武帝。武帝听了高兴，他认为这是山神对他的祝愿和欢呼，立即命祠官以三百户租税封太室奉祀，又下令禁止在山上伐草木，名太室为崇高邑^{〔5〕}。离开少室山后，武帝来到泰山。北国天气寒冷，三月的泰山仍然草木未生，只有苍松盘曲，自然景色不合万物勃兴、春意盎然的景象，因此，武帝这次没有正式行封禅礼，只在山巅上树立了一块大石碑^{〔6〕}。这就是人们今天在泰山极顶看到的那块耸立在玉皇宫门外的色泽淡黄、平整光滑的无字碑。武帝用这块自底而上渐削、顶部加帽，成为三迭巨石的巨碑，寄托他高上加高的升封之意，显示自己“受命于天”、“功德贯世”，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功绩。四月，他又来到泰山郡的治所奉高（今山东泰安东）。这时的泰山已郁郁青青，武帝准备封禅。他先率群臣在梁父山（今泰安东南）祭了八神之一的地主^{〔7〕}。四月乙卯，正式封泰山。侍中、儒者按照武帝的诏令，戴上长七寸、高四寸用鹿皮做的形如覆盆的皮弁^{〔8〕}，这是朝会时戴的古冠。天子的

皮弁用十二块鹿皮缝合而成，缝合处缀以五采玉。戴皮弁含有奉天法古的意思。然后，武帝亲自用弓箭射死一头牛，将鲜红的牛血洒到地上，象征着封禅礼开始。在泰山山麓朝东的地方，早已筑好长宽各一丈二尺、高九尺（汉制）的祭坛，坛下已埋好祭告上苍的玉牒。玉牒上文字绝密，不得为世人所知〔9〕。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絨以金绳，封以石印，用皇帝的玉玺封存。祭坛前，群臣肃立，天子行礼如仪，场面肃穆庄严。礼毕，武帝在霍去病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的陪同下，开始登泰山。攀登1545米的泰山绝顶，在汉代是件苦事，那时还没有从中天门通南天门的盘道（盘道为唐代始建），只有称为环道的山道。汉武帝当年四十六岁，他自恃体魄健壮，在年青的霍子侯搀扶下，为了表达对上苍的虔敬，一步一喘地攀登上山。经过艰难的攀登，武帝终于登上泰山绝顶。他俯瞰众山皆小的齐鲁平野，对泰山的伟大发出由衷的感慨。他虔诚地告祭了上苍。祈求天帝祐护汉家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第二天，他和侍臣从山北下山。丙辰，来到泰山北麓的肃然山（今山东莱芜西北六十里，民间讹为宿岩山），进行祭祀后土（大地）的礼仪。武帝穿上黄色祭服，在钟鼓声中，他拜祭了用江淮产的茅草垫衬起来的五色土。封禅大礼完成后，武帝回到在奉高西南四里的古代明堂遗址，群臣按次序上前向皇帝颂功德。武帝下诏改这一年为元封元年，免除泰山下五县民众的租赋，赐民爵一级，并规定以后五年一巡狩，祭祀泰山，命诸侯在泰山脚下建造府邸〔10〕。

汉武帝先后八次封禅泰山，时间是元封元年三月、四月，元封二年四月，元封五年三月，太初元年十月，太初三年，

天汉三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11〕}。先后写了封禅议对（祭祀文）十九篇^{〔12〕}。

汉武帝登上了泰山顶峰。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代也登上了世界的高峰。这不是偶然巧合的象征，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元封元年的封禅大典，是以西汉极盛时代雄厚的物质经济为基础的。自汉初至武帝初年七十年间的与民休息政策，恢复并发展了被破坏了的的社会经济。王朝政府不想多打扰民众，百姓能安心耕织，刑罚也用得不多，将相功臣没有忘记亡秦暴政的教训，议论、从政都比较宽厚^{〔13〕}。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秦末汉初人民颠沛流离的情况已看不到，乡下六七十岁的老翁甚至没有去过城市，愚昧无知得象孩子似的。司马迁感叹说：“这不正是孔子说的有德君子吗^{〔14〕}！”汉初经济凋敝，曾出现一石米卖五千钱，人吃人、死者过半的惨象^{〔15〕}，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京师国库里的钱财多得数不清，太仓贮粮满溢腐败，城市里马匹成群，骑劣马的没有脸面参加朋友的盛会。看守城门的小官都有好米好肉吃。当官的都能当太平官，父子相袭，时间久了，干脆以官名为姓氏^{〔16〕}。人口恢复发展很快，汉初大城市留下的户口只有十之二三，分封的大侯不过万家，小的只有五六百户。到文、景时，流民返回，大侯拥有三、四万户，小侯也成倍地增加了户数^{〔17〕}。到武帝时，估计全国人口约有五千多万。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汉文帝说：“百姓没有内外徭役，能够安心种田，天下殷富，一斗粟只卖到十几钱。到处鸡鸣狗叫，烟火万里，称得上是太平和乐之世^{〔18〕}。”这虽有溢美之意，但大体符合当时真实。汉武帝在文景之治国力强盛起来的基础上，

发动了对匈奴侵略战争的反击战，从元光二年（前133）到元狩二年（前121），经过无数次的战争，终于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与此同时，他用兵边疆，开拓疆土，奠定了中国今天广阔疆域的基础。他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汉文化，促进了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这一切，是以汉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坚强后盾的。清朝人总结说：“自汉武击匈奴，通西域，徼外诸国，无不慑汉威，是时汉之兵力实强^[19]。”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当时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化高峰之一。西汉涌现出一大批科学文化名人，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大音乐家李延年，等等，他们用科学与文化的丰碑记下了汉帝国的繁荣昌盛。

王朝伟大的成就会使统治者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在颂歌声中，统治者忘记了巨大的成就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汉武帝发动的十几次对外战争，有些战争是必要的，如对匈奴的战争；有些战争是侵略性的，如对大宛的战争。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先后征发了约二百多万兵力，战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流传下来的两首汉乐府：《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沉痛地反映了汉代人民无法忍受的战争苦难，表达了他们的厌战情绪：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弩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